

1. 信心大躍進

(1929—31)

「因爲神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悟性歌頌！」

(詩四十七7)

那是1929年。矗立在江邊城牆上的古塔，告訴我們即將抵達目的地了。青海高原上的融雪，沿長江（揚子江）洶湧而下，混濁的湍流衝著船舷，汽輪徐徐地停下來，乘客紛紛準備在江中央轉乘駁船登岸。駁船迎著急流，搖搖晃晃的朝泥濘的北岸駛去，五名青年踏過跳板，踩上乾地，著陸的地方，正是安徽省省府安慶市。苦力們一窩蜂地湧上來，要給我們扛擡行李到語言學校。他們喧嚷著、討價還價，場面一片混亂，熱鬧極了！

這是我第一次踏足在中國的街道上，心情既興奮又感新奇。大開門戶的店鋪前，有趣的招牌上寫著神祕的中國字；街上各式小販、理髮師在巡迴著爭相叫喊，招徠顧客；熙來攘往的平民大都穿著藏青色的長袍，加上空氣中夾雜了渠道的臭氣和中國香料的辛辣味，形成了令人難以忘懷的第一印象。

過去三天在怡和公司豪華汽輪上的生活已逝去。沿岸鎮江、南京、蕪湖曾經令人陶醉的景色亦已過去。有節奏地吶喊的苦力們，從船上卸下種類繁多的各式貨物來，可見這偌大、奇異的國家，和她在發展中的國民，是具有何等巨大的商業貿易潛能。載我們來安慶的汽輪將繼續沿江而上，經漢口、宜昌，然後，乘客須轉換較小的船隻赴重慶，沿途經過美麗的急流，再上長江三峽，那處常有覆舟之險。早期宣教

士乘搭住著艇戶人家的船，得靠人力拉畢全程。這條壯闊而水流急疾的揚子江切分中國南北，在共產黨執政以前，一直未有建橋跨江，但時至今日，在南京、漢口及重慶等地，已築有宏偉的跨江橋樑了。

那年秋天，我們五人乘坐加州丸 (Kashima Maru)，從倫敦啓航，在海上六星期之久，終於抵達上海，又有一星期在吳淞路「中國內地會」總部稍事安頓。內地會的中國總部設在這幢殖民地式建築物內，於1865年由戴德生牧師創設，旨在向中國遼闊的內陸播佈福音。抵步時，總幹事何斯德 (D. E. Hoste) 熱烈地迎接我們這羣最新入伍的宣教士。那位充滿奇想、敬畏神、又常常禱告的總幹事，正是由名噪一時的運動家、軍官組成的「劍橋七傑」之一。他在1885年來華，1902年繼承戴德生中國內地會總負責人的職任。何先生此時領導中國內地會事工已有三十年了，雖然外表年高德劭，但，儼如一個近代的族長——他依然保持了他軍人的結實和挺拔。

1926年之中國，正陷於翻雲覆雨的掙扎求存中。1925年5月，一名英國警察在英租界內槍擊一名共產黨學生滋事者，掀起一觸即發之反對浪潮，致令各差會紛紛召喚他們的宣教同工撤退至較安全的沿岸城市，其中有二千名宣教士相信宣教工作已臨末日，他們就離開了中國，不再復還。同時，中國教會亦深陷困境，教會被指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信徒被侮辱為「帝國主義的走狗」。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整整兩年，在非常擠逼的居住環境和前景未卜之際，勾留沿海一帶，再三反省差會之基本政策，同時，又充滿盼望和忍耐地，等候中國內地之門重開。

到了1928年，危機漸次消滅，外國使館又再批准宣教士回到他們的傳教工場。此時，中國內地會領袖洞悉時勢的緊逼，體認廣大福音未及之中國土地和人民有迫切需要，於是，何斯德總幹事在1929年發出他歷史性的呼籲：兩年內徵召二百名傳福音勇士來華。按照當時的混亂形勢，在人來說，這事成功的機會甚微；然而，何斯德是一位當世的「迦勒」——對這位充滿信心的人，沒有一座山是逾越不過的，

而就是他，作了這偉大的「大躍進」！

前赴安慶語言學校的五位青年人，就是應徵這次增援的「先頭部隊」。未幾，各國宣教士接踵抵達，他們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瑞士、德國和瑞典——各有不同的國籍、不同的脾性、不同的口音，卻組成這奇特而愉快的一羣，開始一種「可畏」的學習——學習中國語文。另外，揚子江下游的揚州，有一羣女宣教士也開展這為期半年的中國語文密集課程。據當時的慣例，無論商業機構或宣教差會都要求他們的成員恪守未婚最少兩年，好專注學習中國語文和適應中國文化，故此，語文學校男女學生得要分開上課。這規定顯然有它的優點。

男士們有幸受教於一位畫藝出色的中文老師嚴夫子。嚴夫子不懂英文，卻非常擅於作滑稽的表演、又富幽默感。他採用直截了當的教學方法，命我們逐字逐句的啃中文。五十年後的今天，那段初學中文的刺激和歡愉仍然歷歷在目：嚴夫子有數位蓄著鬍子的年老「學究」作助手，他們會一邊吮著綠茶一邊昏昏地聆聽學生們逐字逐節的讀出約翰福音。每天下午，我們都來幾回免除規例的籃球賽，盡情地把早上的悶氣倦意發洩消散，也乘機做做我們迫切需要的運動。

這邊廂語文課程剛開始不過數星期，我們的城市也爆發叛亂，反抗當地駐軍，雖迅速被平定，但為安全計，從此我們卻要被困在語文學校內，再不敢對戰事抱樂觀的期待。六個月的語文課程結束前，差會派遣一位主任來與每位學生面晤，揭曉奉派事奉工場的省分，於是，還是操著生硬中文的年輕宣教先驅便要「大躍進」，往中國每個角落散佈。我們一隊首先出發，緊接著是別的隊伍，直到二百位宣教士都全部照計劃遣派出去。

最富戲劇性的部署相信應是派遣七位宣教士，其中包括一位醫生，前往位於中亞洲之新疆了。他們長途跋涉地自中國北部乘貨車橫越戈壁沙漠，直抵省會烏魯木齊（即「迪化」）。這七位拓荒者之領袖是佐治亨德 (George Hunter)，他是一位退伍軍人，曾受英皇授 OBE 勳銜，遠於1908年已經抵新疆地區孤軍作宣教工作，較聞名於世的彼斯馬達

(Percy Mather)、蓋羣英 (Mildred Cable) 和她兩位同伴 (雅號「三人組“Trio”」) 在那遼闊的沙漠綠洲中分發聖經還早得多呢！七位拓荒者很快就發現他們所進入的宣教工場正受內戰與傷寒疫症所肆虐，非常不幸，隊中年輕的醫生在一年多後，接觸傷兵病人時感染了傷寒而病逝，他在蘇格蘭的胞弟聞訊，立即自薦前赴填補遺缺。五十年後的今日，當地信徒仍然滿懷感激地細心打理醫生的墳地和墓碑，同時，在烏魯木齊一帶，教會極其興旺，新疆省信徒人數成千上萬，與半世紀前，即1934年，實有天淵之別，足證宣教先驅的勞苦犧牲並不徒然。

適逢中國極黑暗的年代，徵召二百位宣教士來華之行動可謂果敢而有心思，為中國內地會宣教事工和引動普世關懷中國的推動，灌注強而活潑的新動力。神在掌管歷史的進程，祂預先知道中國未來的歷史，以何斯德牧師為合祂心意的人，向他顯明自己的意旨。在適切的時刻，神感動一羣年輕男女，差遣這隊精銳的宣教生力軍來中國，成為抵擋撒但攻擊的堅固城堡。透過這羣男女，千萬中國人將會認識救主，教會就會在中國各地紛紛建立，許多教會未來領袖得蒙在神話語上造就訓練，好面對挑戰。二百位宣教士紛紛在各地宣講基督，自西南的部族至邊區半關閉的西藏山區；從中亞洲散居新疆綠洲的居民，到北陲平原的蒙古游牧人民、以至北部及西南部之凶悍的穆斯林回教徒；他們設立數十間醫院服務病弱者、創設中國青年及兒童教育事工，亦有後來在各大學學生中結出纍纍果實，也有在基督教中學、聖經學院和神學院擔任教職；又有學者投身完成了西藏文、蒙古文和其他部落語文之聖經翻譯工作；同時，女宣教士為推廣教育普及和在減少文盲的工作上作了偉大的貢獻。縱使有些地方未能立時見到反應，但神的話語像不死之道種，深深埋藏在中國土壤裏，五十年後，萌芽生長，碩果豐盈。假若神沒有呼召那兩百位宣教士、假若欠缺了那信心的大躍進，今日中國教會的境況將會怎樣的不同的呢？

2. 中國文化的搖籃 (1870—1900)

「耶和華作王；……祢的寶座從太初立定，祢從亙古就有！」

(詩九十三1、2)

臘盡春回，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的山西省。記得我起初在山東半島海岸的烟臺（又名芝罘或之罘），「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子弟學校裏做了一年教員以後，就到內地旅行，在北平逗留了相當長久，並且深深地愛上了那美麗的歷史古都。現在，則又要開始對華北山嶺縱橫的山西省的「戀情」了。那亙古常存的峯巒，金色蒼茫的大地，以及千百年來車馬馳騁的軌道，直到現在還在我心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山西終年常晴，不分冬夏，常是皎日朗照，萬里無雲，祇有在七或八月之間，才會有黃梅雨季節的風暴。春季果樹花開，麥苗吐秀，秋季高粱起青紗帳，怡然景色，令人難忘。我還記得見過那裏的駱駝隊成羣，載運棉花，也有騾隊和趕騾子的騾夫，騾車裝貨，而華貴的、有車蓋的車輛載客。有些城市的城牆，與亞伯拉罕的時代差不多的古老，距離現在約有四千年，城牆上城樓高聳，宏偉壯麗，下有巨大的城門，城內街市趕集，非常熱鬧。我們宣教士皆不能忘情於涼爽宜人的度假山地，那原來是水車磨坊，以後改建成假日居所，百花競放，令宣教士之中有人在那樣的地方，邂逅終生伴侶。

我從北平乘火車進入山西境內，改經唯一的公路，由一位年資較深的宣教士開摩里士牌汽車，送我南下。最後抵達獲指派去的福音工場時，感到無限欣喜。汽車在塵土飛揚的乾旱田野裏，大約以每小時二十英里的速度行駛，穿過一道